錮身鎖命：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

著 —— 張少強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鋼身鎖命：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
張少強　著
發行：HKSC X jcMotion@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主編：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
編輯：張嘉輝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劍跋弩張，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追求發展主義的都市想像，不時由新媒體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仍在重塑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

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份認同；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8) 介入當下的香港現況，對回歸中國的香港進行切要的記述；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 2015 (張少強).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張少強 (2015)。 *鋼身鎖命：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 [電子版[第二版] 。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張嘉輝 (主編）。香港：jcMotion。取自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摘要

引言

「水濃於血」：食水供應

「國以食為天」：食物供應

「講政治，顧大局」：新近情況

結語

官方檔案

參考書目

鎶身鎖命：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

張少強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要

中共力求「洗腦贏心」的統戰攻勢，一直無法在前九七香港廣泛取得香港華人認同，但中共终能在1997年成功重申香港主權。究竟中共怎樣在此劣勢之中，維持它在香港的跨境支配？本文試作探討，指出早自毛澤東年代，中共的統一政策已有另一力圖「鎶身鎖命」之爭作為把持香港主權的最終武器。透過查探大陸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本文提出中共長期都有刻意佔據生活物資貿易來進行政治統攝，從而確保它能在談判桌上要求英國交還香港主權，兼而反制香港人的抗共情緒。這樣的政治經濟權術也見沿用至今，繼續做為中共在後九七香港鞏固其統治地位的一大支柱，使其權力支配可以超克意識形態的取向分歧，直接控制生靈存在的必然條件，持續滲透整個社會的身體腹腔。

關鍵詞：(後)冷戰，五豐行，東深━香港供水工程，食水及食物安全，生靈政治戰略

引言

香港，作為一個華人城市，曾是英國的殖民地，也是中國境外的一大戰略基地，長期為大陸提供重要緩衝包括進口物資、賺取外匯、發展海外連線、搜集海外情報、以至在冷戰時期突破美國圍堵。為求鞏固這個基地，在場宣示權力，中共立國之初特設香港新華社(現為中聯辦)駐港，監察香港事務，並在教育、文化、媒體、商業及勞工等界別建立親共的左派組織，進行權力滲透及政治宣傳。然而，中共實行的意識形態統戰，已被指出沒有成功洗腦贏心(winning minds and hearts)，尤其是在1967年香港左派大舉「反英抗暴」之後，中共在港的實力及形象，都因是次行動失敗，終告元氣大傷 (金堯如，1998)。這就確有必要追問：中共何以能夠在此劣勢之中仍能成功重申香港主權？

透過檢視內地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我提出中共在把持香港主權上，長期都是追求錮身鎖命(controlling bodies and lives)多於洗腦贏心。錮身鎖命這種支配方式是以佔領別人的生存條件來駕馭別人，或透過恩惠方式，或利用威嚇手段，或藉詞純為貿易，要別人誠心順從，或被迫就範，或半推半就。它的性質屬於一種超克冷戰對立的，後意識形態的，兼具軟硬力量的生靈政治戰略(bio-political strategy)。它的

使用往往可在現實政治之中充當壓倒對手的銳利武器之餘，還可在市場交易上用來謀取厚利，獲得經濟商機。早在1960年代，周恩來也曾明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定是一項政治任務」，並因應「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此項國家既定的香港政策，向各級官員作過這樣的訓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後退」(齊鵬飛，2004：44)。由此可見，大陸對香港所作的物質供應並非純屬地方層面的尋常貿易。自始之時，它已包含中共的戰略考慮，且是一條同時牽涉「地方—國家—全球」三重地緣政治的重要戰線。隨著現時中港關係日趨綳緊，香港特區政府表現每下愈況，民眾抗議聲音愈來愈烈，我預期錮身鎖命這種生靈政治支配方式，在統攝及反統攝角力過程中，構成的中港張力勢將日漸浮面。

我所用的研究資料包括香港、中國及英國的官方檔案，本地、國內及海外學者的現有研究，以至相關官員的回憶錄及坊間書籍。我的論點乃是壟斷食水及食物供應一直都是中共香港政策的核心部分。中共終能在談判桌上要求英國交還香港主權，同時總可壓倒港人抗共情緒，都跟中共刻意借佔據生活物資貿易來進行政治宰制息息相關。由於單憑「一國兩制」的統治模式現已不足以回應後九七香港的複雜形勢，這種管治策略亦見沿用至今，繼續做為中港貿易之間一大有利可圖的長期買賣，以及中共在後九七香港確保統治地位的一大支柱。

「水濃於血」：食水供應

食水安全經常都對中英兩國所制定的香港政策起着或明或暗的決定作用，包括與此相關的高層政治交鋒及外交談判。當中共於1949年初，勢將接管大陸之時，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深受威脅。因應中共有可能乘勢進佔香港，英國表面上擺出充滿信心的防衛姿態(官方檔案：CAB/129/35)。可是，英國內部深知，香港這塊殖民地全靠興建水塘來把天然雨水變為食水來源，但當地水塘並不足以確保殖民地有穩健的食水供應。故此，英國內部的真正方針反而在於盡量避免要跟中共交戰，並把「爭取中國的默許」列為當前急務(官方檔案：CAB/195/7：151)。另一邊廂，中共出於現實政治考慮，也作出了「暫不收回」香港的權宜決定，讓英國的殖民統治可在香港維持直到1997年新界租約期滿為止。可是，中共同樣深知香港一直水源短缺，並對準香港這點要害，策動水源政治(water politics)作為牽制英國殖民者的繮繩，把香港這一塊有待統一的境外領土拉入在控制範圍之內。

1959年，北京計劃在鄰近香港的深圳興建水塘乃此項水源政治部署的發端。作為全國水利工程的一個部分，這個特定水源政治計劃名為「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或簡稱「東深—香港供水工程」。它要肩負的目的是以改善地方供水系統

之名，把香港納入由內地主導的供水網絡之中，以東江河水來沖破兩地隔斷，令中共的跨境支配隨著食水滲入整個香港，日日夜夜透進所有港人身體。1960年，計劃初定，北京即經廣東省政府向英方提出此項水利工程(廣東省水利廳、香港水務署，1998)。

對於兩國政府來說，此項供水工程同樣充滿政治考慮。1963年，周恩來親自視察工程之後，就曾直接指示下屬：「該工程關係到港九三百萬同胞，應從政治上看問題」，並把工程列為「援外專項」，直接由國家計委撥出3,800萬援外專款作為經費(李健輝，2007：iii)。英國在接獲消息之初即已警覺此項工程，正如時任港督柏立基的評估所示，實為中共的跨境戰略，可是香港確有尋找額外水源之需。英國最終都是接受了此項工程，但同時打算要在港興建大型水塘來維持水利自主(官方檔案：CO1030/1279—1281)。

兩國官員尚在商討細節期間，香港又告爆發嚴峻水荒。1963年，香港水塘總存量一度跌至僅有總容量的1.7%。港英政府不得不實行緊急制水，並把級別由原先每日供水三小時最終升至每四日供水四小時的可怕程度。為了應急及加緊節流，港英政府採取的相關措施還有重開水質沒有保障的地下水井，在全港舉辦節約用水運動，提供市民節約用水行動指引，容許宗教團體以不同儀式祈雨，針對浪費食水訂立罰款及實行監禁，以至派遣空軍向雲層發射乾冰打造人工雨水(何佩然，2001)。可是，全都僅在治標，甚而並無實效，港英政府始終是要好像1902及1929兩次香港史上有數的水荒事故那般，向廣東省

採購食水來紓解旱情。由於當時這種做法是要派出油輪運送食水，在運作上極不方便也不合算，所得水量也不足以完全應付廣大人口的食水需求，實非可循之策。1964年，港英政府唯有進而決定跟廣東省政府就東深—香港供水工程簽下永久合約。自1965年起，此項計劃也開始可以提供港人恆常食水供應，沿一條接一條的水管運送內地東江水到港（官方檔案：CO1030/1654—1659）。對中國來說，此項計劃的落實明顯讓它踏出重申香港主權的一大戰略步伐，令自己的形象比起英國更為有能力恩澤港人之同時，亦可成功穩奪香港主權的一條重要防線。

為了自保不失，英國也曾盡其所能增強殖民地自身的供水系統，務求制衡中國的水利攻勢，增大殖民地的自主性。例如：在簽訂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合約之時，英國拒絕中國原先提出可向香港免費供水的提議，反要堅持按價購買內地食水，以表此項協定純屬經濟交易而不是政治恩賜。雙方交涉也要限於地方上的香港政府及廣東省政府，以免此項供水計劃成為國家層面事情。英國亦都反對公開內地供港食水將逐步增加的協定，以保它可繼續在港興建水塘，受影響居民無法藉此為由反對相關工程 (官方檔案：CO1030/1654—1659)。

雖然本地水塘數量在此項中港供水協議簽訂之後仍有增加，新建水塘，如：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規模亦日趨龐大，可是香港本土的供水系統總是追不上同樣日趨龐大的人口。故此，港英政府又在1959年起，計劃採用海水化淡來鞏固香港的供水自主，甚而同時考慮核能發電來配合此項供水工程。197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雖然放棄了核能發電的計劃部分，仍是不

惜重本投資海水化淡技術，並終在香港興建了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官方檔案：CO1030/1659)。按當時政府預期，此項水利計劃是長遠的「保險政策」(同上:144)。工程約要20年完成，但完成之後，該海水化淡廠可滿足香港每年耗水總量40%。可惜，此項水利計劃，雖然屬於英人防衛供水主權的最後一著，終因成本過高在1978停產，並由於長期荒廢而於1982年決定拆毀(何佩然，2001)。

計劃既已稍縱即逝，港英政府只好再跟廣東省政府商討，要求內地增加供水。結果，東深—香港供水工程在1974、1979及1989年，分別進行了三次擴建，包括加建水庫及水管，以及增強泵水及輸水系統。隨著所有擴建全部竣工，內地供港水量即時颷升四倍，由原本1980年代200百萬立方米升至2000年代800百萬立方米。就香港每年耗水總量來說，東江水所佔比率也見扶搖直上，1970年僅在24%，1980年已達34%，1990年升至68%，2000年後長期超出70% (表一)。相比之下，由本地水塘提供的食水在同一時期，只有100至300百萬立方米，明顯無法獨力滿足香港食水需求。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命脈已因依賴東江供水而在內地掌握之中。

表一：廣東省對香港的食水供應

單位：百萬立方米

年份	由廣東省輸入的食水		香港總耗水量
	容量	佔香港總耗水量百分比	
1965	41	22%	185
1970	66	24%	276
1975	93	26%	360
1980	172	34%	508
1985	319	50%	637
1990	590	68%	873
1995	690	75%	919
2000	706	76%	924
2005	771	80%	968
2010	715	75%	951

資料來源: 廣東省水利廳、香港水務署，1998；香港政府統計處 (1995— 2011)。

東深—香港供水工程奠定了中國在香港的水力霸權(hydro-hegemony)，並藉壟斷食水供應從中獲利。香港既已在中國的水利系統之中，由中國主宰它的基本生存條件，中國比起英國就可在談判之先，對香港前途有更大發言權和支配力。這解釋了為什麼東深—香港供水工程竟能在中共建國六十周年慶典成為榜上有名的「重大經典工程」。它的「重大」可稱「經典」明顯不是就其工程規模來說而是就它在確保香港回歸的戰略作用之上(李家翹，2010)。

沒有獨立供水能力，香港的命運總要視乎中國的態度，也不由英國可再以昔日的船堅炮利或文明使命來扭轉定數。正如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1993)在個人回憶錄中指出，她就香港前途跟中國談判的原有計策是想以英國具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永久主權來換取1997年後英國可在香港維持治權，並認為這是有一舉三得的效果：中國能夠如期重申香港主權；英國可以繼續統轄香港；「整塊殖民地」 (香港) 在「英國的延續管治」之下，將「有良好未來」。可是，戴卓爾夫人同時寫道，整個香港都要「依靠大陸的食水及其他供應」，且「有超過90%的土地是租借的」(259)。她在事前已經感到難有跟中國討價還價的把握。當鄧小平堅決反對她的共治方案，她只好同意由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模式，並接受英國的殖民統治將在後九七香港完全終結(488—495)。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就是如此具有決定作用的政治武器，既令英國在談判桌上被擱在一旁，也教中國在1997年前已可就香港的主權宣示它的宗主地位。

對於內地供港食水，香港居民既看到隱憂但又無法抗拒。消息傳出之初，社會大眾確曾擔心依賴東江供水的政治風險。1960年，一份本地報章就有大字標題：「從各種跡象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共必憑藉水源，向港作出政治敲詐」。相似的反共警告亦在其後的另一則輿論可見：「東江水之來主要屬於政治性，若政治局勢有變，立時可以涓滴不至」(廣角鏡，1981：71)。由於時為冷戰高峰，香港居民亦都擔心事件違反以美國為首的對華禁運措施而演變成折磨香港的中西鬥爭。然而，美國一直都無公開提出反對，反而表示不會禁止香港輸入中國的「共產水」(張連興，2007：295—296)。

整體來說，港人的警戒意識最終都因長期飲用東江水而被沖淡。港人的日常生活也因東江水輸入再沒有如往日那般需要望天打卦或苦受制水之澀。正如何佩然(2001)指出，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所起的深遠政治作用就是提升「社會上的親華情緒」(214)。儘管香港居民可能繼續恐共或已變得不再在意，香港的生死總要靠大陸提供物資這一類想法卻成為香港內部長期存在的大眾常識。「血濃於水」乃華人民族主義用來建構並指涉華人內部一直都是緊密相連的常用話語。可是，中共的水源政治卻在實踐層面把中港的緊密相連變成「水濃於血」，透過食水把中港結為一個不可割離的共同體(community)。故此，李家翹(2010)認為「1979年後香港的供水史，展現的是香港的供水權逐步為中國大陸所掌控；因為它要依靠中國供水，香港實質上已提早回歸祖國」確為的論(69)。雖然英人曾經花上大量心力來確保戰後香港的供水自主，可是香港本身實在難以單

憑內部的淡水供應系統就足可解決全城的食水需求。下及海水化淡計劃都是終告失敗，英人縱然想過要令香港成為一個可以長治久安的獨立城邦(city-state)，但早在1982年中英正式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之前，這已屬徒然撲空之舉(Lee，2013)。以下部分將再以食物供應為例，闡述中共怎樣使出同類的生靈政治控制來鞏固它在香港的跨境支配。

「國以食為天」：食物供應

英國佔領香港之初，已然感到這一塊殖民地的先天缺失就是其土地面積太過細小，根本難以內部極為有限的天賦資源自給自足。在此前提之下，香港有生存危機一直都是英國管治香港之時無法擺脫的權力隱憂。雖然英國官員在1841年怒把香港講為「屋都難有一間的荒蕪島嶼」，實為誇張描述，但也不是全無理由。香港大部分土地都是山巒地帶，僅餘的可耕土地一直都是生產有限，根本不足以應付本地人口日常農產需求。下及戰後，香港都市急遽擴張，農田數量持續下跌，土產食物更是無法滿足直線增長的龐大人口(表二)。在香港整體經濟之中，農業生產所佔比率亦都微不足道。從1950至1960年代，本地農業佔全港本地生產總值只有3至5%　(ERCCUHK，1969)。下及1970至1980年代，該數字已跌至1至2%。在1990年打後，更低至0.1至0.9% (表三)。

表二：戰後香港農地的減退

單位：平方千米

年份	香港整體土地面積	農地數量	農地佔香港整體土地面積百分比
1960	1,031	132	12.8%
1970	1,032	125	12.2%
1980	1,060	81	7.7%
1990	1,072	69	6.4%
2000	1,099	57	5.8%

資料來源：《香港年報》(香港政府：1954—2010)。

表三：戰後香港經濟中農業部門的衰落

年份	漁農業總額 (百萬港元)	漁農業佔本地生產總值 百分比	本地生產總值 (百萬港元)
1970	377	2.0%	19,119
1975	533	1.4%	36,974
1980	1,110	0.9%	128,040
1985	1,238	0.5%	242,423
1990	1,432	0.3%	536,870
1995	1,453	0.1%	1,016,115
2000	920	0.1%	1,180,688

資料來源：《香港年報》(香港政府：1954—2010)。

由香港漁農署 [前稱漁農處] (2001—2010) [1950—2000] 提供的數字同樣顯示：本地農業並非香港農產食物需求的供應支柱。例如：華人主要食糧乃是稻米，可是全港稻田總數卻由1954年尚有9,458公頃，持續下跌至1960年只剩8,724公頃，1970年餘下5,602公頃，且在1980年僅存30公頃，1985年殘留10公頃，並於1986年之後完全絕跡香港。儘管新界一帶直到今天仍有蔬菜生產，可是它在全港蔬菜消耗總量上所佔比率卻一直下滑，其數字為1960年代尚有40%，1970年代還在30%，1980及1990年代已跌至20%，2000年代以後更是跌至少於10%。本地牲畜情況亦都相約，在全港牲畜消耗總量上所佔比率長期都是低於50%。自1980年代伊始，該比率甚而低至20至30%，還不時少於10%。

相比之下，本地家禽生產看似例外。1980年代，它在全港家禽消耗總量上僅佔20至30%，踏入1990至2000年代初期，數字不跌反升到40至50%。但一切都在香港接連爆發禽流感疫情之後全面轉衰。為了預防禽流感再度爆發，香港政府決定買回本地家禽農戶經營牌照。這使到本地家禽生產急遽萎縮，在

總量上，由1999年12,659噸跌到2009年6,417噸。就本地漁業來說，香港漁民一般都在南中國或以外海域作業。在大部分年頭，他們的海產都佔全城總耗量50%以上。但水產的貢獻則為數不多，僅佔全城總耗量10至20%。香港雖然本為漁村，可是就連香港本土漁產亦都早已無力自給自足。

作為東亞具有領導地位的海港城市，香港擁有的食物運輸網絡可謂無遠弗屆，近乎世界各地都有食物進口。可是，由於地緣及文化相近，香港的主要食物供應地始終都是中國大陸，尤以新鮮食物最為明顯。1951年，北京責成由中國外經貿部直轄香港華潤集團旗下的五豐行作為內地供港食物的總代理。自此以後，中國透過五豐行佔據了香港的食物市場並從中獲利，穩操了跟食水一樣同屬具有重大戰略作用的食品供應。在運作上，周恩來亦曾親自統籌中國鐵道部及外貿部特設三趟快車，全年行走364日，從雲南、武漢及上海運送各地新鮮食物到港，包括豬、牛、羊、雞、鴨、鵝、水產、蔬菜、生果等等。即使大躍進之時內地饑荒，文革時期陷入動亂，中國都未曾有意終止對港食物供應(吳學先，2010)。當香港左派在1967年之時發動罷市作為「反英抗暴」行動之一，北京中央根本沒有支持，反而要求香港左派結束抗爭(冉隆勃、馬繼森：2001)。

由此可見，冷戰時期，中共的香港政策雖然經常帶有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及反資本主義的激烈措辭，可是實情一直都是僅以這些激烈措辭來擺出合乎意識形態戰線的政治姿勢而已。就連第一代領導人認為，透過壟斷食物供應來維持外匯收益比起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以至反資本主義更為重要。

照當時英國的情報分析顯示，香港確為中國賺取外匯的主要來源(官方檔案：FCO21/104)。周恩來亦曾直言：「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354)。只不過，時下的內地官方論述往往會把五豐行美名為「香港的菜籃子」，專門運送食物到港的三趟快車為「香港的生命線」，沒有讓人清楚得知這些供應在政治上、經濟上及戰略上涉及的現實考慮和利益計算(郭國燦，2009)。

畢竟，香港的食物市場也不是單由北京支配所有。如以白米市場為例，據鄭宏泰及黃紹倫(2005)研究所得，從十九世紀開始，香港的白米市場長期都是潮籍華商的天下。他們以族群內的親屬及商業網絡壟斷了由泰國運往香港及南中國的白米貿易。雖然在1980年代打後，大型連鎖超級市場壓倒了潮籍華商在白米市場上的傳統優勢，但泰國依然屬於香港最大的白米供應地。為求供應穩定及儲備充足，港英政府自1995年起訂立了一系列白米管制措施來確保香港有多元的白米供應地。1968年，中國曾以慈善捐贈華人同胞之名，有意在管制措施以外額外輸出白米，港英政府照樣反對，並認為這只不過是中國在1967年，香港左派「反英抗暴」失敗之後，「賺取政治資本及向香港政府施壓」的替代手段(官方檔案：FCO21/205：7)。結果，由中國進口香港的白米長期處於次級位置。每逢泰國遇有白米失收而令到出口減少，中國白米佔香港市場比率或可升至30至50%。一旦泰國供應回穩，中國在該比率上即見下跌，在1980年代中期已低於50%，1990年代中期則低於20%，到了2000年更低於10% (表四)。

表四：泰國與中國白米入口香港比較

單位：千噸

年份	泰國入口	泰國所佔總量百分比	中國入口	中國所佔總量百分比	整體入口總量
1955	162.4	67.30%	39.3	16.29%	241.3
1960	171.1	48.29%	70.5	19.90%	354.3
1965	199.0	57.68%	88.2	25.57%	345.0
1970	185.9	55.46%	84.0	25.06%	335.2
1975	118.7	35.55%	179.8	53.85%	333.9
1980	123.0	34.45%	185.4	51.93%	357.0
1985	151.9	43.10%	148.1	42.03%	352.4
1990	230.7	66.24%	54.5	15.65%	348.3
1995	251.6	77.25%	20.4	6.26%	325.7
1999	250.1	79.22%	8.9	2.81%	315.7
2000	239.2	81.08%	9.7	3.28%	295.0

資料來源：鄭宏泰、黃紹倫(2005: 191—193)。

由中國進口的其他日常糧食情況也是相約。1950年代，香港進口中國蔬菜高達50至70%。但從1960及1970年代開始，此項數字已在大部分時候跌至50%以下。在1980及1990年代，更是進一步跌至少於20至40%。由中國進口的海產及水產同樣報跌。在1960年代，比率尚有50至60%，下及1980年代，跌至30%至40%以下，2000年之後則更是少於20%。唯一例外就是活豬及家畜。香港一直都要極度依賴內地供應。自1969年代伊始，內地進口香港活豬及家畜長期高佔70%，並在往後的多個年代，經常高出80% (表五)。

表五：中國對香港的主要食品供應

單位：百萬港元

年份	蔬果		魚類		牲畜及家禽	
	中國入口總額	中國佔總額百分比	中國入口總額	中國佔總額百分比	中國入口總額	中國佔總額百分比
1960	125.23	47.45%	64.93	57.30%	156.55	63.15%
1965	205.16	51.03%	116.10	65.75%	392.18	88.59%
1970	302.63	45.10%	172.54	51.40%	393.71	79.52%
1975	531.56	41.94%	331.87	50.15%	1,040.20	90.51%
1980	1074.20	37.78%	633.76	35.68%	1,562.04	95.52%
1985	1918.35	38.55%	1,150.82	31.71%	2,232.32	94.79%
1990	3669.93	41.20%	2,824.36	33.18%	2,563.34	99.05%
1995	3708.99	29.45%	2,360.61	16.76%	2,968.51	88.18%
2000	2545.80	23.06%	2506.20	16.54%	2,480.80	76.63%

資料來源：《香港經濟年鑑》(1961—1998)，《港澳經濟年鑑》(2001)。

這些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對戰後香港華人大部分時候都有較大錮身鎖命能力。雖然情況不是沒有變動，並在白米，蔬菜和漁產上有下滑趨勢，但這仍然足以確保中國的生靈政治攻略具有決定性的威力。它能夠成功控制香港食水及食物安全顯然令到英國深感威脅而又苦無抗衡之法。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 (1947—1957)乃在中共威脅之下繼續維持香港殖民統治的首名總督。在個人回憶錄中，葛量洪（1965)認為，香港勢難「好像大多數的英國殖民地那樣，進行自治或獨立」(105)，並已預期香港會按時在1997年交還中國，其原因正是在於香港要依靠中國供應生存所需。他寫道：「就此我想提出一項統計數字......除卻芝加哥之外，香港比起世界上其他城市屠宰豬隻都要來得更多，而90%的豬隻是來自中國」(172)。

直至1967年左派騷動之時，香港陷入恐慌，其時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 (1964- 1971) 所作的局面評估也是得出相同結語：「我們依賴中國的食物......是相當大量的。中國（對香港）的物資供應有任何突然停止，都會令這裡大亂（官方檔案：FCO21/214:140)。香港所以有此脆弱局面在前殖民地高官黎敦義 (Denis Bray) (2003)的個人回憶錄亦有說明：「有好幾天，中國沒有火車到來運送豬隻。這確實嚴重因為中國總是有可能停止我們要靠它的食水及食物供應。我們曾在鄰近地區尋找其他供應來源，但沒有地區可以供應我們所需的數量。」(126)

因此，中國只消截水截糧即可定香港生死，實乃英國對這塊遠東殖民地一直沒變的看法。就連美國都是抱有相同的局面評

估。雖然美英兩國不約而同都是相信中共採取軍事行動攻佔香港的機會不高，但兩國亦都認為中共若然作出停運行動的話，香港立時無法自保。這是何以在1950年代，英國要求美國提供香港軍事支援，美國只承諾提供「道義支持」 (Mark，2004)。結果，英國在往後日子只得獨力抵禦中共威脅，以別的行動來鞏固其殖民統治。因應全球冷戰的反共路線，英國首先就是渲染香港左派的暴力傾向，把他們反英親共的愛國主義打成屬於極度危險的恐怖主義(強世功，2008)。英國還在政治宣傳上刻意突出中港兩地經濟差距來褒揚資本主義的優勝之處(呂大樂，2011)。到了1989年，中共武力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英國既繼續以大型基建項目來平添香港一片欣欣向榮的氣氛，亦進而在政治建制上訴諸民主改革來爭取港人認同(So，1999)。這些晚期殖民主義行動確實有助英國籠絡人心，大大提升英國的管治聲望。可是，英國到頭來還是無法扭轉香港終要交還中國的歷史定局(Tsang，2004)。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 (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1992-1997)在總結香港政局之時，就英國殖民主義的終要結束，也只得嘆言：「香港島及九龍半島 —— 所有領土全屬割讓的 —— 要靠新界及以外的腹地提供食物和食水」(Patten，1998：12-13)。

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至今已發展至在輸出物質之同時輸出論述。中國官方措辭經常都會把這樣一種力圖錮身鎖命的生靈政治講成北京一直為港人著想的「仁政」，屬於具有中國傳統儒家理念的道德政治實踐。這樣的官方詮釋往往又跟不同的知識活動混在一起，成為了好些內地知識分子及地方官員就中國對香港食水及食物供應的標準講法。例如：古星輝

(1981)認為香港的經濟成就須歸功中國支持：「香港就是這麼奇怪的城市。信仰社會主義的大陸政府支持它的繁榮。......北京提供了戰後卅三年來香港社會穩定的客觀條件，也給予了投資者充分的信心。......實際上，香港戰後卅三年的『繁榮與安定』環境，是北京營造的」(4)。曉晨(1994)唱和這樣的愛國調子並就中共的關愛港人作出這樣的讚頌：「無論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還是文革動亂期間，內地一直及時穩定地向香港供應大量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和生產原料，從而保證數百萬香港同胞的安居樂業。每當香港遇到困難，總是祖國最先向它伸出熱情之手」(5)。強世功(2008)也有相類的讚頌，為中共的香港政策作出充滿民族情懷及訴諸儒家精神的論述宣傳：「這一切無私的援助，不是基於利益的計算，而是基於情感的認同，即我們都是中國人，是基於自然的友愛凝聚起來的相互援助的大家庭。中央對香港的無私援助包含類似家長對子女的情感關懷。......把政治秩序建立在人心之上，無疑是我們儒家的政治傳統」(157)。齊鵬飛(2004)所寫的評論則可說是更為政治露骨，更近國家宣傳：「如果離開了『中國(內地)因素』，就談不上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就談不上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奇蹟的『香港現象』」(45)。

這些論述宣傳的一大特點往往就是刻意極度煽情，且要在道德高地上把愛國主義、傳統理想、民族精神、家長主義及利他主義等，盡量堆砌出來。這些論述宣傳亦跟中共的第三世界政策在原則關係上有大量一脈相通的地方(a distinguished lineage of principled relations)，包括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追求民族自主、提供無條件資助，以及互惠互利等(Strauss，2009)。雖然這些論述宣傳帶有誤導色彩，也旨在打

造香港是從屬大陸的形象來滿足大陸本土聽眾，但這些論述宣傳確實有助中共遮掩它在現實政治上的策略部署及功利計算，對其統一香港及全球連線都有美化作用。

「講政治，顧大局」：新近情況

時至今天，中國已按「一國兩制」模式，收回香港主權有好一段時期。這意味中國在追求統一上只要領土重奪，再不講求體制一致。對於香港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及生活文化上的歷史分歧，包括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的兩極對立，它也不作消解反而容許兩者成為「一國兩制」中至少可以「維持五十年不變」的「兩制」，使到後九七的中港關係保留了前九七的冷戰結構，並在對立狀態之中持續惡化，出現日趨互不相容的嚴重矛盾。這種中國式的認同政治 (politics of recognition)已見到是無法確保後九七香港成為現時中共在國家政策上經常強調的「和諧社會」(Lee, Nedilsky & Cheung：2012)。

為了挽救後九七的政治危局，中國終在2003年實行CEPA(中文全稱：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英文全稱：Mainland-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試圖訴諸貿易優惠、經濟利益，購買穩定局面，換取香港民情。在政治宣傳上，中國亦經常高舉CEPA對香港經濟的重大好處，並把CEPA講為國家特意恩澤港人的及時措施。可是，特區政府內部的檢討報告卻有近乎相反的保留，指出香港在2000年代初期開始的經濟復甦並非單由CEPA使然。在講及CEPA的作用之時，報告只是強調CEPA有「無形效益」，

對香港經濟有重建「信心」的效果(官方檔案：CB(1)1849/06-07(04)：5)。據報告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在2003至2006年間，由CEPA帶來的新增職位累計起來，其實只有35,000個，數字所得不足香港就業人口總數的1%。由CEPA帶來的貨品交易總額在2003至2007年間最高的紀錄也遠低於預期，僅佔香港整體出口4.1%，對大陸出口也只有10.6%，即大部分中港之間的貨品交易根本無需CEPA的優惠安排 (表六)。在服務交易方面，由CEPA在2007至2009年間帶來的生意收入累計為1,984億港元。這個看似鉅大的數字亦見跟官方宣傳給人的印象有頗大的出入。以香港每年本地生產總值來算，該數字所佔比率只有3至4%。在CEPA底下，38個受惠的服務界別當中也只有四個真的受惠，並由它們佔了相關生意收入總數98% (表七)。

表六: CEPA 底下每年商品貿易出口總值

年份	CEPA 商品貿易總額 (億元港幣)	佔本地對大陸出口百分比	佔本地整體出口百分比
2004	1.2	3.0%	0.9%
2005	2.4	5.3%	1.9%
2006	3.3	8.1%	2.4%
2007	1.3	10.6%	4.1%

資料來源：官方檔案：CB (1) 1849/ 06-07 (04)

表七: CEPA 底下每年服務貿易商業收益

年份	CEPA 服務貿易總額 (億元港幣)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億元港幣)	CEPA 服務貿易總額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
2007	540.14	15520	3.4%
2008	756.53	15929	4.7%
2009	687.85	15509	4.4%
總額	1984.52	46958	4.2%

資料來源：官方檔案：CB(1)2065/09-10(01)。

由此可見，CEPA的政治經濟作用較多是在心理方面，反而在實質方面是頗為有限和局部。就中共要增強它對港人錮身鎖命的物質支配能力來說，CEPA充其量只有補充作用。這令到中共竟要循環再用毛澤東年代制定出來的舊香港政策來維持它的主權。在2012年1月2日，中國在《人民日報》刊佈，全力保障香港食水及食物的穩定供應和質量安全，將是新的政治挑戰並已正式要求相關企業在對港供應上「講政治，顧大局」。可是，中國為求令國力能夠遍及全球，其急劇發展已令自己蒙受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由於發展過程缺乏有效規管，內地的食水及食物安全經常爆出醜聞，以至成為好像2008年「毒奶粉事件」那般愈演愈烈的政治風波。這類事故亦已在香港成為媒體經常廣泛報道的新聞重點，港人對於內地供應的食品出現信心危機(《文匯報》，2013年3月23日)。隨著內地食物價格飛漲，香港食物價格也受到拉動。2008年，通脹高峰之時，白米、豬肉、牛肉、家禽及蔬菜，在港的售價分別上升44.9%、35.1%、37.6%、13.5%及16.7%。整體食物售價亦見上升16.8%。雖然2009至2011年間升幅放緩，但香港食物價格仍維持上升趨勢 (表八)。

由於生活負擔急遽加重，香港社會對於現行食水及食物供

表八: 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通脹比率

年份	米	豬肉	牛肉	家禽	蔬菜	整體總數
2000	-3.5%	-7.4%	-0.2%	-5.2%	-4.5%	-2.2%
2001	-1.1%	-6.3%	+0.3%	+2.9%	+1.1%	-1.7%
2002	-4.0%	-7.7%	-0.2%	-0.7%	-6.6%	-3.1%
2003	-3.1%	-4.7%	+0.9%	-9.8%	+1.1%	-1.7%
2004	+2.9%	+0.4%	-0.2%	+26.2%	+3.7%	+2.5%
2005	-3.7%	+3.4%	+2.5%	-2.4%	+12.5%	+3.2%
2006	-0.9%	+1.5%	+2.3%	+12.1%	+4.2%	+2.5%
2007	+9.1%	+18.6%	+12.3%	+11.9%	+2.8%	+7.1%
2008	+44.9%	+35.1%	+37.6%	+13.5%	+16.7%	+16.8%
2009	+8.2%	-9.2%	+7.3%	+14.2%	-3.1%	+0.9%
2010	-1.8%	-2.7%	+0.9%	+1.8%	+13.1%	+3.5%
2011	+0.2%	+18.5%	+11.4%	+8.7%	+1.7%	+9.9%
總數	+47.2%	+39.5%	+74.9%	+73.2%	+42.7%	+37.7%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2000—2011。

應情況亦見愈來愈多抱怨及異議。香港立法會時有議員質疑政府何以如此依賴內地東江供水，其售價持續上升，其水質卻是日益受到環境污染而變差(官方檔案：CB(1)734/12-13(04))。長期以來，五豐行近乎獨佔香港活豬供應亦都觸發同業不滿，並一度要求政府徹查其經營方式有否干犯反壟斷法(官方檔案：CB(2)699/02-03(03))。下及2011年，香港復有數百名市民，在政黨帶領之下，走上街頭，高喊反通脹口號，要求政府採取措施平抑食水及食物價格(《東方日報》，2011年8月15日)。

食水及食物安全已成中港關係愈來愈尖銳的一大政治經濟爭端。可是，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並非一門蝕本生意。自1960年代，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開始運作，香港政府跟廣東省政府協定的售價一直上升(表九)。正如營運單位內部的管理方針所示，供給香港的東江水是「政治水、經濟水、生命水」(李健輝，2007：138)。自1980年代，大陸開放改革之後，其售價亦都不再單以政治作考慮，反而愈來愈重經濟回報(同上：105)。這樣雖然可為廣東省帶來可觀外匯收入，但也令香港向廣東購買食水的單位價格近乎全世界最高。2000年，新加坡向馬來西亞購買食水的單位價格為港幣0.33元一立方米，但香港向廣東購買食水的單位價格卻為港幣3.085元一立方米，差不多高出十倍(何佩然，2001)。

表九: 東江食水單位售價

年份	每立方米單位售價 (港元)	增幅比率
1960	0.050	—
1970	0.234	268.00%
1980	0.500	113.67%
1990	1.297	159.40%
2000	3.085	137.85%

資料來源：何佩然，2001：222。

2005年，香港終於跟廣東達成新的協定，香港可以按月調整它向廣東購買的食水量而不用繼續受到按年計算的固定限制。在新的協定之下，香港向廣東購買食水的開支總額確曾從2005年的25.30億元港幣輕微回落至2006年24.95億元港幣。但該開支總額很快再度回升並高出原先水平，於2009年為29.59億元港幣，於2010則高達31.46億元港幣(香港水務署，2000—2010)。

五豐行的食品生意同樣收入可觀。按五豐行於2000年私有化之前一度公開的帳目資料顯示，該行每年生意總額一直上升，從1992年463.60億港元，升至1999年666.39億港元。每年盈利也從1992年7.70億港元，升至1999年59.71億港元(表十)。因此，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實有重要利益牽涉其中，並非對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好處的國家恩賜。若然中國不加干預食水及食物價格升幅，中國勢將難以繼續穿上後冷戰的仁政外衣，以物質的支配作用及後物質的道德措辭來打動香港，繼而鞏固其收復台灣的統一政策。

表十：五豐行每年營業總額及利潤

年份	營業總額(億元港幣)	稅後利潤 (億元港幣)
1992	463.6020	7.7003
1993	428.2511	9.672
1994	463.2177	23.129
1995	521.6480	31.9821
1996	449.8387	37.6865
1997	636.0027	52.7902
1998	692.1635	63.0193
1999	666.3962	59.7123

資料來源： 五豐行有限公司，1995—1999。

結語

本文闡述了自冷戰以來，中國的香港政策中，食水及食物安全的重要作用，包括它的戰略、政治、經濟、以及措辭特點。本文指出中國確能在洗腦贏心以外，以後意識形態的錮身鎖命政治，反勝英國殖民主義及與全球冷戰連同一起的反共攻勢。中國亦沿用這種生靈政治攻勢，配以煽情的道德宣傳，在後九七香港以祖國愛顧港人之名，維持它的跨境支配。直到目前為止，中國其實從未試過真的停止輸送供港的食水及食物作為政治行動。當然，這是仍為殖民地之時的香港及其殖民宗主國英國，沒有可能估計得到的事後之見。結果，中國只消憑藉它對香港有定生決死的潛在威脅，已足可令這塊英國殖民地總是要看中國意向，甚而務須在其要求之下規行矩步。這實為一大歷史諷刺。大部分的香港華人都是為了生活、逃避大陸共產政權而不惜犯險越境的離散難民，甚或是殖民地鎖關之後的非法偷渡者。但他們到頭來還是由於生活所需而跳不出中共的生靈政治控制。話雖如此，錮身鎖命政治亦非無往而不利之舉，它反而含有勢將積重難返的自身弊端。

由於抗拒內地日趨強硬的來的政治干預，破損本土的經濟，復以港人日常生活逐漸受到內地人口衝擊，一股激進的自主追求的力量已在後九七香港迅速浮現。由這股追求激發出來的社會抗爭既繼續爭取民主，也在引發各式各樣捍衛本土的保育運

動及身分政治。其論述及行動甚而包括反對內地人口湧入香港的公開號召及示威活動，就連昔日英人在1946年之時，於當時港督楊慕琦的政改方案中，一度短暫閃現但終告失敗的「城邦想像」都被重整出發，作為力爭香港應要自主的立論依歸(陳雲，2001)。縱使英人本身對其殖民地的自給自足能力一直都有根本保留，可是這些新近的香港城邦論者，甚或獨立論者則不以為然，對於「中國因素」更是沒有英人那樣的政治憂慮。

面對這樣的中港局面，中共顯然需要倍加把持香港的食水及食物安全來維持控制。部分官員甚而接連公然提出「斷水論」來作出阻嚇，使出錮身鎖命政治來遏止這些新起的激進主義（《蘋果日報》，2012年10月30日）。然而，食水及食物安全可能會出現天然或人為差錯，這些差錯往往又會愈來愈難擺平，甚至根本無法擺平；縱能擺平，也要賠上極大生靈代價，引來嚴重的社會牢騷，以至折損政府管治地位。好像2011年12月之時，H5N1病毒威脅重臨香港，受感染雀鳥及雞隻再度出現社區。為了防止疫情擴散，香港特區政府立時下令全城宰殺活雞17,000隻，並禁止本地活禽買賣數周。結果，疫情確實沒有擴散，但卻由於新春旺季將近，惹來雞販不滿及擔憂，也令港人日常生活秩序及市面運作受到政府直接干擾(《太陽報》，2011年12月22日)。

總而言之，錮身鎖命政治是有雙重性質的，既要用來加強政治支配，又要藉此圖取經濟利益。這就導致中國的香港政策總是存在兩難。當中國要標榜它的香港政策乃「仁政」，它便務須不惜成本繼續維持大量低價食水及食物供給香港。可是，

食水及食物供應確有運作成本，不可永遠都是無利可圖的單向經濟優惠。若然中國真的採用斷水斷糧來對付香港，中國也將自斷政治經濟優勢，削弱自身統攝「大中華」的實力。況且新近的情況顯示，香港內部已對中國這種生靈政治攻勢表示反感，還以香港一直都要用錢購買為由，公然反駁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從來不是恩賜(《蘋果日報》，2013年1月25日)。故此，若借Derrida(2004)的術語來闡述，錮身鎖命政治在治理後殖民/後冷戰/後九七香港上，實為有效亦有毒的「偏方」(pharmakon)[1]。它能增強中國的帝國建造(Empire-building)，也會累積中國的權力危機。

1 Pharmakon 這個希臘字眼在英語可以譯為drug。但筆者無法找到一個漢語字眼可以一如這個字眼的原意那般，同時含有良藥和毒藥的雙重意思。暫且把它譯為「偏方」這個漢語詞彙，取其帶有可以有效治病但又較具有害風險之意 ， 望有翻譯能手，有以教我。

官方檔案

英國國家檔案館:
CAB/129/35. “Visit to Hong Kong, 6th June — 9th June, 1949.”
CAB/195/7. “Hong Kong.”
CO 1030/1279. “Water supply in Hong Kong (1960—1962).”
CO 1030/1280. “Water supply in Hong Kong. Chinese reservoir at Shum Chun (1960).”
CO 1030/1281. “Water supply in Hong Kong. Chinese reservoir at Shum Chun (1960-1963).”
CO 1030/1654. “Water supply - Hong Kong (1963—1965).”
CO 1030/1655-1657. “Water supplies - Hong Kong (1963—1965).”
CO 1030/1658. “Water supplies - Hong Kong. Chinese reservoir at Shum Chun (1963—1965).”
CO 1030/1659. “Sea water distillation (1963—1964).”
FCO21/104. “Chinese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from Hong Kong, 1967.”
FCO21/205. “Chinese reactions to events in Hong Kong, 1967—1968.”
FCO21/214. “Food and water supplies in Hong Kong and supplies from China, 1967—1968.”

香港立法會：
CB(2)699/02-03(03)。2002。「豬肉供應鏈的競爭情況」。
CB(1)1849/06-07(04). 2007.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Impact on the Hong Kong Economy" .
CB(1)2065/09-10(01)。2010。「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B(1)734/12-13(04)。2013。「關於東江水的供應及水質的背景資料簡介」。

參考書目

《人民日報》。2012。「讓港澳同胞過個好年」。1月2日。
中共中史文獻研究室。1993。《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共中史文獻研究室。
中國生產促進會香港分會。1961—1998。《香港經濟年鑑》。香港：中國生產促進會香港分會。
五豐行有限公司。1995—1999。《五豐行有限公司年報》。香港：五豐行有限公司。
《太陽報》。2011。「雞農怒斥，畀周一嶽害死」。12月 22日。
《文匯報》。 2013。 「食品安全亂象」。 3月23 日 (http://sp.wenweipo.com/1120sp/。查詢日期：2013年3月26日)。
冉隆勃、馬繼森。2001。《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香港：明窗出版社。
古星輝。1987。《古星輝論香港》。香港：鏡報文化企業公司。
何佩然。2001。《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
吳學先(撰稿)。華潤(集團)有限公司《紅色華潤》編委會(編輯)。2010。《紅色華潤》。北京：中華書局。
呂大樂。2011。「在倫敦與香港之間」。於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 (編)。《香港．生活．文化》。頁，287—301。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李家翹。2010。「為何香港依賴了東江水？」。於許寶強(編)。《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頁63—73。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李健輝。2007。《東江碧水潤紫荊》。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東方日報》。 2011。「開支樣樣加，上街反通脹」。8月 15日。
金堯如。1998。《香江五十年憶往》。香港：金堯如紀念基金。
香港水務署。2000—2010。《香港水務署年報》。香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1954—2010。《香港年報》。香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0—2011。《消費物價指數年報》。香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統計處。1995—2011。《香港統計月刊》。香港：香港政府。
香港漁農署〔香港漁農處〕。2001—2010〔1950—2000〕。〔《香

港漁農處年報》〕。香港：香港政府。
張連興。2007。《香港二十八總督》。北京：朝華出版社。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郭國燦。2009。《香港中資財團》。香港：三聯書店。
陳雲。2011。《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
港澳經濟年鑑社。2001。《港澳經濟年鑑》。北京：港澳經濟年鑑社。
齊鵬飛。2004。《鄧小平與香港回歸》。北京：華夏出版社。
廣角鏡。1981。《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廣東省水利廳、香港水務署。1998。《東深—香港供水工程：粵港經驗交流及合作總結》。廣州：廣東水利廳
鄭宏泰、黃紹倫。2005。《香港米業史》。香港：三聯書店。
曉晨。1994。「從新中國的對香港政策說起」。《今日港澳》，第10卷，第5期。
《蘋果日報》。2012。「一面龍獅旗引起的反思」。10月 30日。
《蘋果日報》。2013。「港區政協煽風點火大罵港人『沒有共產黨，你水都無得食』」。1月25日。
Bray, Denis. 2003. *Hong Kong Metamorphosi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acques. 2004. *Dissemination*. New York: Continuum.
ERCCUHK (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9. *Long-term Economic and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ojections for Hong Kong, 1970, 1975 and 1980*.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rantham, Alexander. 1965.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Lee, Joseph Tse-Hei, Lida V. Nedilsky & Siu-Keung Cheung. 2012. *China's Rise to Power: Conceptions of State Governa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ee, K. Nelson. 2013. 'The Changing Nature of Border, Scale and the Production of Hong Kong's water supply system since 195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DOI: 10.1111/1468-2427.12060.
Mark, Chi-Kwan. 2004.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ten, Christopher Francis, 1998. *East and West: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on Power, Freedom and the Future*. London, UK: Macmillan.
So, Alvin.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Julia C. 2009.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Historical and Rhetorical Lineages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 (September), 777—795.
Thatcher, Margaret. 1993.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UK: HarperCollins.
Tsang, Steve. 2004.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I. B. Tauris.